

关于《现代文艺》与《志摩遗札》

唐 达 晖

本刊本期发表的徐志摩书信六封,是新近在一九三五年的《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上发现的。

《现代文艺》创刊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终刊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出九十五期。刊物是由当时在武汉大学执教的一些作家、学者办的。主要作者有陈西滢、凌叔华、苏雪林、陈衡哲、袁昌英、朱东润等。编者在《发刊词》中提出五条宗旨:一、“不想借本刊宣传什么主义”。强调文艺的尊严和独立性,“以为文艺的任务在于表现那永久的普遍的人性,时代潮流虽日新月异,文艺的本质,却不能随之变化”。二、“想竭力戒除党同伐异的恶习”。三、“愿意借本刊尽一点提倡健全文学的义务”,反对“病态文学”。四、“主张本刊对于艺术须力求其完整”。五、“希望对华中文艺空气的造成可以有点帮助”,把武汉“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可以看出,这个刊物的文艺主张,与以前新月派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是很相近的。

在沉寂的武汉文坛,出现这样一个名流主办的文艺刊物,是引人瞩目的。创刊不数日,站在反对左翼文艺运动立场的向培良,就在报上发表了《谨致〈现代文艺〉诸先生》,一方面称赞“诸先生希望造成华中文艺的空气,这实在是一伟大事业。……西滢、衡哲、雪林诸先生都是文坛名宿,慨然有这种愿望,真可以说是朝阳高岗的盛事。而且这也使武汉大学与社会隔离的习惯改变过来,使最高学府能够实际领导社会事业”;另一方面,又认为“诸先生的主张,未免稍偏于消极,而缺少一种积极的可以遵循的态度和意见”(1935年2月22日《武汉日报》副刊《鸚鵡洲》)。向培良的意见,与《现代文艺》标榜的“不宣传主义”的宗旨,是抵触的。因此刊物第三期上就发表了编者的《谨答向培良先生》,说:“发刊辞偏于消极方面,也有其原因。我们觉得文学的主张应

从作品本身表现出来。而且文学的范围也如人生一般广大,若拿一种主义或几个条件代表它,不唯有顾此失彼之嫌,而且怕蹈买椟还珠之弊。”进一步阐明了编辑方针。这也表明刊物力图以超然和自由的立场出现。

《现代文艺》是周刊,每逢星期五在报纸第三张或第四张刊出(偶有延期或提前)。头一年每期篇幅多为半个版面,后一年渐次扩大到四分之三版。内容以小说、散文、诗为主,也有文艺理论、图书评介等。作者并不限于武大的人。据《停刊之词》所列,两年来刊物上出现的作者名字,达七十多人,其中不少是各地文坛知名之士或新进作家。除前面提到的外,还有陈铨、孙大雨、石民、赵景深、沈从文、朱光潜、吴世昌、卞之琳、陈瘦竹、林庚、芦荻、杨刚、李辉英、王西彦、胡适、冰心、杨振声、戴望舒、萧乾、高植、俞平伯、严文井、沉樱、李蕤、靳以、巴金、李健吾等;还有已故诗人徐志摩、朱湘。对于一个内地的地方性报纸的副刊来说,“这张网撒得不算不远了”。所以编者认为,“作者人名之多,范围之广,可以说是本刊的一种特色。女作家之多,差不多占了本刊一半的篇幅”。

这个作者名单,的确颇为可观。从发表的作品来看,质量也多较好,刊物也是比较谨严的。这在当时一般报纸的副刊中,还是不可多得的。但刊物的生命,却不满两周年。编者在停刊时声称:“本刊的停刊,是遇难而不是病故”。并说,回顾两年历程,是按照“预定的路线”,“始终在跋涉着这一条平坦的,却不大时髦的道路上的”。认为,发刊时提出的宗旨,一至四条是做到了,可是第五条,即希望造成华中的文艺空气,“却不能不承认自己是失败了。因为本刊即使在国内文坛上占了一个小小的地位,但是对于华中文艺空气非但不曾引起一个波澜,而且简直不曾惹起一点涟漪。……它好象与华中文艺空气不生任何关系”(《停刊之词》)。这

种情况的造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客观因素之外,就刊物本身来说,则不能不认为与其宗旨有关。三十年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激烈。尤其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三六年十月,《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主张在为抗日救亡服务的前提下,“各人各派之自由发展,与自由创作”。新的形势,要求作家紧紧地把握住现实,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在这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倘仍以所谓文艺“绝对的、尊严的独立性”,“不能做任何主义的工具”为标榜,那就会使文艺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这样的宗旨,与时代和人民太“隔膜”、“疏远”,是难以掀起“波澜”,造成“空气”的。看来刊物的停办,也是形势使然。

《现代文艺》的陈西滢、凌叔华,都是徐志摩的故交。刊物曾以《志摩遗札》的标题,陆续刊登徐志摩生前的书信。现在所辑的六封,收信人名字和写信日期,都被略去(只有一封有月日,但无年份)。其中两封记述了《问谁》和《为要寻一颗明星》的写作情况,这两首诗后来收在《志摩的诗》中。又一封信谈到他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的住处(《志摩的诗》中也有一首以这个地址为题的诗)。再根据信中其他一些内容,可以推断这些信大致写于他从欧洲留学回来后,一九二三年和二四年左右在北京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写作《志摩的诗》这个时期。

这些信是写给谁的呢?今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发表的凌叔华《谈徐志摩遗文》,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她在这封给陈从周的信中,谈到徐志摩生前交给她的一箱文稿的下落,接着又说:“我后来回去武大,办武汉文艺周刊,只好把志摩写与我的信(多半论文艺的)七八十封信,每期登载一二封(那是很美的散文),可惜战争一来,武汉文艺便销灭掉。后来我们逃到四川住了三年,也无法把稿子带去。至今以为憾事。武汉文艺周刊是附属武汉日报的。不知你们有没办法可以找到1936——1937武汉文艺周刊的日报?事隔多年,想来不会有办法了吧?”

据我们调查所得,这一时期的《武汉日报》,的确有一个《武汉文艺》副刊。这个刊物创刊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是由成立不久的武汉文艺作者协进会主办的,“以提倡民族文艺为宗旨”。它有两种版本:每星期六附印于《扫荡报》的,叫“土曜集”;每星期三附印于《武汉日报》的,叫“水曜集”,所以实际上是半周刊。由于抗战爆发后,纸张来源困难,《武汉日报》从八月二十二日起,由日出对开三张半,减为

一张,副刊版面也随之而消失。《扫荡报》也同时紧缩篇幅。因此《武汉日报》上的《武汉文艺》(水曜集)只出了七期。这个刊物既不是武大的人办的,与凌叔华没有关系,也没有发表过徐志摩的信,显然不是凌叔华说的那个《武汉文艺》。

那么,是不是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个《武汉文艺》呢?我们翻检了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三年的《武汉日报》,都没有发现。这段时间,该报的多种文艺副刊中,武大的人主办的只有一个《现代文艺》,发表过徐志摩书信的也只有《现代文艺》,而且据有关资料得知,凌叔华正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从各方面看,只有这个刊物符合凌叔华信中所说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她的信中提到的《武汉文艺》,实为《现代文艺》之误;而在《现代文艺》上刊登的《志摩遗札》,也就是信中所说的徐志摩给她的信的一部分。

应当说明的是,《现代文艺》一九三五年共出四十五期,因报纸缺页,我们实见四十四期。在这四十四期中,仅有四期载有《志摩遗札》,共六封(三六年的刊物共五十期,现已查阅四十七期,未有发现,可断定即使有也不会多)。这与凌叔华信中谈到的一九三六至三七年登载七八十封,不但时间有出入,数量也太悬殊。我们以为这大概是由于年深月久,记忆模糊,使她把年份弄错了;发表信札的数量,也属误记。再不然,信中的意思,原来只是说志摩的信共有七八十封,“每期登载一二封”,并不是说全都登出来了。

一九三五年赵家璧准备编辑《志摩全集》时,茅盾鼓励他尽最大的努力去搜集信札、日记之类。因为“要研究一个作家,日记和书信最能忠实反映作家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这是研究者所不可能从作品里得到的最宝贵的资料”。于是他和陆小曼向各方征集志摩书信,但反应不强,征到的信不多(《回忆徐志摩和〈志摩全集〉》,《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当时凌叔华没有把她保存的信交给他们,至于《武汉日报》上发表《志摩遗札》的事,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今年三月,赵家璧先生来信谈及:“我与陆小曼在三十年代编辑的八卷本《徐志摩全集》,将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于今秋在香港按原纸型付印”,并希望能找到凌叔华所说的徐志摩的信。这部《全集》,编成已近半个世纪,几经波折,终得问世,编辑者的欣慰之情,自可想见。这几封《志摩遗札》,当时没有编入。就我们所知,后来他人所编《全集》或《补遗》等书,也未收录。(下转第7页)

常注意的。否则，他们就不能获经济效益。我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因此，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性问题，就是要生产出最佳适用性的产品，即生产出好产品来。生产部门要生产出适用性最强的好产品，不仅是产品质量好，数量多，而且必须是产品成本低。质量、数量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互相制约的。但一般说来，质量是产品的主导方面。所谓“产量多少”，“成本高低”，都是指一定质量的产品说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一定数量的数量或成本。只有在质量上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其生产的数量才是越多越好，其成本也越来越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就会迅速发展。否则，就会是完全相反的情况。这就是质和量辩证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生动体现。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商品价值的质和量的分析方法，如同整个《资本论》一样，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我们的现实生产和理论活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⑦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第38卷第191页。

②③⑧⑨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9、121—122、217、218、124页。

③④⑤⑩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91页，第29卷第250页，第32卷第335页，第31卷第385页，第24卷第22页。

⑫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⑬⑮⑯⑰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48、16、51—52、63、86页。

⑳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㉑ 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21日第1版。

（上接第94页）

现在把它们找出，重新发表，也算为《全集》增添一点新资料。

徐志摩的书信，目前还发现不多，因而这几封信，对于研究者来说，还是值得珍视的。徐志摩在信中说，他赏识的是“性情之真”，而最憎恶虚饰故作。虽然朋友通信，有的也难免拘束，但这些信，他却写得“顶自然，也顶自由”。难其真切自然，也就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诗人的性格，反映出他在这一时期思想情绪和生活状况的一个侧面。从有的信中，还可以窥见他作诗的创作过程，这是在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的。信中的两首诗，后来收进集子时都有些改动，也可供我们比较研究。从信中，我们看到他厌弃世俗的烦扰，赞美宁静和谐的大自然，向往性灵的解脱。这些地方多少表现了诗人对充满丑恶和庸俗的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光明的追求。但是

他的理想和追求是抽象的、个人的，这又不时使他流露出感伤、空虚甚至颓废的情绪，如他自己所说，“我这常在黑地里构造意境，其实是太晦涩了”。但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他的基本情调和风格，还是轻快和清新胜于哀愁和颓丧的。信中，内心世界的真率表露，自然景物的致密描写，都显示出诗人的风格特色。

现在根据《现代文艺》重新发表六封信，以原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编上(一)至(六)的序号。除因便于排印，将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现在通用的简体字外，其余文字、标点，悉如原样，不予改动。明显笔误或排错的字，用方括号〔 〕注在后面；原报上模糊难辨或缺之处，以○代替；有疑义或需说明的地方，则加注释。

（上接第96页）

注释：

①③ 它，原文作“牠”，疑为“她”之误。

②⑦ 此句下，应空一行。

④ 此处括号和柏字，是原有的。

⑤ ，掬原文作“搯”，显系“搯”之误。

⑥ 傻和粽，原文都是繁体，字形相似。

⑧ 此处括号有误。

⑨ 挑绿水，疑即华兹华斯之妹多萝西(Dorothy Wordsworth)之异译。